

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洪惟仁

1. 臺灣語言學的先驅：小川尚義

所謂「臺灣語言學」這個名稱，廣義而言泛指世界上所有有關臺灣語言的語言學研究，研究者不必限於臺灣人，凡是從語言學的立場對臺灣語言的調查、分析、比較等研究，都可以稱為「臺灣語言學」。它主要的研究對象包括在臺灣的閩南語、客家語和南島語言，當然也包括臺灣華語。

小川尚義是第一個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博古通今對臺灣閩南語進行詳細的語言描寫、詞彙調查、閩南語方言比較，進而進行漢語方言比較，並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重建中古音系；他也以同樣的方法，進行臺灣南島語及南洋相關語言的調查，然後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重建了南島語的某些語言結構。

小川尚義實在堪稱為「臺灣語言學」的先驅者。但本文的主題在介紹小川尚義對於漢語語言學研究的貢獻，因此對於南島語研究的貢獻就略而不談了。

1.1 小川尚義小傳

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明治二年二月九日（1869年3月21日）出生於日本四國島，三歲過繼給松山御寶町小川武一為養子，故姓「小川」。1895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畢業。「博言學」是語言學的舊稱，日本現稱「言語學」。畢業論文指導教授是正是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上田萬年¹，上田留學德國，專攻歷史比較語言學，

¹ 上田萬年(Kazutoshi Ueda, 1867-1937)日本江戶人，1888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和文科畢業，旋入大學院，1890年奉派赴德國柏林大學、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曾師事青年文法學派 G.vonder Gabelentz 學印歐比較語言學、「國語運動」，經三年半，1894年6月回國，7月為文科大學教授，教授語言學。時年29歲。上田專攻歷史比較語言學，其論文以1898年運用歷史語言學原理發表〈p音考〉論證日本語進行了p→h的變遷一文最有名。1899年獲文學博士。1897年開設「語言研究室」至1927退休培養很多語言學人才。其門生有小川尚義、新村出、保科孝一、時枝誠記等名語言學家。

1894 年回母校任教，擔任語言學教授，一生奉獻於語言學教育，培養許多語言學人才，他在日本語言學界的地位略當於中國的趙元任。

1896 年小川尚義即將畢業的那年春天，上田先生對小川尚義說：「今年七月你就要畢業了，要不要去臺灣看一看？臺灣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²為了編臺灣語、蕃語的字典，招聘一名專攻語言學的青年。」小川尚義本來就認識到臺灣語言的研究對研究漢語及南島語的重要性，所以當下欣然承諾。七月回故里，由於年初臺灣發生芝山巖事件，有六位日本人教師（所謂「六士先生」）被殺，兄弟都替他擔心，但小川已決意前往。³

1896 年九月伊澤回日本招考第二回講習員，十月召見小川，兩人談起漢語音韻，十分投機，小川告訴他「要把一生奉獻給臺灣」，果然小川終其一生，都在臺灣進行臺灣語言的調查、研究。小川於同年十二月渡臺，在學務部編纂課當一名課員⁴。

小川尚義是日本領臺期間對臺灣語言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一位語言學家。他一生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的編修官，主要的任務是編纂臺灣話辭典，舉凡總督府所有辭典的編纂的工作幾乎都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如《日臺小字典》（1898）、《日臺大辭典》（1907）、《日臺小辭典》（1908）、《臺日大辭典》（1931-32）、《臺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臺大辭典》（1938 上卷）。這些字典不但部數多、部頭大、而且品質高。若不是小川這樣學術基礎深厚、並且具有堅強毅力的人，這些辭典的編纂不可能辦到。

小川尚義任職總督府期間，除了總督府的職務之外又兼任國語學校教授、一度任臺

² 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留學過美國，曾在電話發明人貝爾門下學過發音學、音標。他是日本漢語學界第一個也是戰前日本漢語學界略具西方語音學的方法以研究北京話的學者，曾以修改的假名符號正確的標注北京話，著為《日清字音鑑》，這是日本第一部北京話的標音韻書，他所用的符號也可以說是中國「國語注音符號」的先驅。1895 年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戰敗，臺灣割日，伊澤拿著這本《日清字音鑑》的原稿毛遂自薦地晉見內定為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大論臺灣教育，樺山當場邀請他擔當開創臺灣教育之任。六月伊澤帶著百餘名懂得北京話的陸軍通譯抵臺北，他起先誤以為臺灣既為清國之地當然通行中國的官話，沒想到當時臺灣沒有人懂得北京話（晉見樺山時出示《日清字音鑑》即出於這個誤會）。於是伊澤乃開始研究臺灣話，編輯會話課本、臺灣《十五音》、臺灣話字典等，對日本人官吏、教師進行臺語教育。臺灣話的假名注音符號即以《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加以修改而成。伊澤由此深切地了解到研究臺灣語言、編纂臺灣語辭典的重要，乃透過上田萬年的介紹找到小川尚義。

³ 1974 年柴田武整理新村出的筆記編為《上田萬年語言學》，是日本最早的語言學概論。《上田萬年語言學》筆記中曾提到一句話「日本支那語的研究不振……竊嘆今日之漢學者但以儒教為中心，語言、文字則無人研究。」也許因為老師的鼓勵激發了小川尚義對漢語的研究興趣。

⁴ 當時的課長是神津仙三郎。神津留學美國阿爾巴尼州立師範學校，1878 年回國任師範學校教授，1896 年四月渡臺任學務部囑託，後昇任課長。任內即開始積極進行臺語研究，曾翻譯馬約翰的《英廈辭典》，準備編纂日臺對照辭典，可惜 1897 年因腸加答兒病去逝，辭典譯了一半便去世了，這項任務從此交給小川尚義。

北高等商業學校長。臺北帝國大學創校之後，1930 年小川應聘為語言學教授，兼任總督府囑託，時年已 62 歲。在總督府的委託下，小川編輯了《排灣語集》(1930)、《泰雅語集》(1931)、《阿美語集》(1933)。小川在總督府時代已著手研究臺灣南島語，應聘為臺北帝大教授之後，更潛心於南島語的調查、研究，任教期間接受上山滿之進總督捐出各方贈送的餞別金，與淺井惠倫等合作進行南島語的調查、研究，一年有半年呆在山地。1935 年以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的名義發表《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1936 年獲學士院恩賜賞。

同 1936 年春，小川告老還鄉，回松山市出淵町養老。歸老後的小川仍為 1938 年出版的《新訂日臺大辭典》校對，並繼續進行南島語研究，發表了五篇傑出論文。1947 年 10 月 21 日小川在故鄉的松山市逝世，享年 79 歲。

小川一生的研究生涯與日本治臺相始終。他孜孜矻矻為臺灣語言的研究奉獻一生，但他淡薄名利，雖然著書很多，幾乎沒有一部著作是用他的名義出版的。前述的臺語辭典的編纂者都是「臺灣總督府」，《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是以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的名義出版。⁵

1.2 臺灣語言學的拓荒者

總督府聘請小川尚義擔任編修官，本意只要他擔任語言教學及編纂辭典等實用的工作，而非學術研究，可是小川尚義卻嚴肅地以語言學家的態度來編纂辭典，並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工作。1907 年總督府出版的《日臺大辭典》附錄的〈緒言〉、〈臺灣語的發音〉、〈臺灣言語分布圖〉，實為第一部在臺灣發表的語言學學術論著。

在小川尚義以前，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站在語言學的立場，尤其是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閩南語，小川尚義不能不說是台灣漢語語言學的開拓者，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了漢語音韻史、漢語比較方言學、閩南語比較方言學、臺灣閩南語音韻學及臺灣語言地理學。

除了漢語研究之外，小川尚義教授在南島語的研究也是一位偉大的開拓者。他曾編了三冊台灣南島語詞彙集，五篇南島語研究論文，最重要的是 1935 年小川尚義與淺井

⁵ 有關小川尚義的事跡參見馬淵東一(1948)、村上嘉英(1966, 1989.2)、小島武味(1981)、洪惟仁(1992, 1994)、Doi(1976)、黃秀敏(1994.5)、酒井(1994.8)。1994 年 1 月 23 日筆者在田中哲郎先生的陪同下前往日本靜岡縣濱松市拜訪小川尚義次男小川次郎醫師。後來整理前人文獻及訪問小川次郎的紀錄寫成小川尚義小傳，收入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本節是該文之節錄。

惠倫合作出版《臺灣高砂族傳說集》。⁶

李壬癸、土田滋在《巴宰語詞典》（2001:390）的〈編後記〉說：

「小川尚義教授是第一位研究巴宰語的語言學家…。其實他就是台灣南島語言學的奠基者，大多數的台灣南島語言都是他最早去調查研究的。今日台灣南島語言之所以受到國際南島語言學界的普遍重視，他確實功不可沒。」

總之，研究台灣語言學研究史的學者都承認小川尚義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臺灣語言的語言學家。由小川尚義發表《臺日大辭典》的 1907 年，至今 2007 年正好是一百周年，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為了紀念小川尚義的貢獻，於 2007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舉辦「臺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語言學先驅對於臺灣語言學的貢獻。

1.3 小川尚義的百年孤寂

雖然小川尚義在臺灣語言學研究上具有傑出的貢獻，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小川尚義對於臺灣語言學的發展很少影響力，在語言學界，不論是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乃至世界上，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李壬癸教授在〈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一文中指出：

「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卓越貢獻，在他生前國際學術界幾乎完全不知道，他的創獲並沒有受到當時國際學術界應有的肯定。例如，德國學者田樸夫 Otto Dempwolff (1934-38) 的南島語言比較研究鉅著竟然都沒有引用小川的研究成果，造成南島語言學史上的一大憾事。他的創見要等到他死後十多年，才引起美國名南島語言學者戴恩 Isidore Dyen (1965) 的注意，並向西方學術界介紹。」

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界更加孤寂，知道的人更少。曾經撰文介紹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的業績的只有吳守禮(1955)、村上嘉英(1966,1989)、洪惟仁(1992)數篇，但只有簡單的介紹。直到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才詳細比較小川尚義與高本漢在漢語音韻學研究的成就。結論是，儘管小川尚義的理論比高本漢的擬音更接近後來的定論，但是高本漢被推崇為現代漢語語言學的開拓者，而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上默默無聞，毫無影響力。洪惟仁（1994）在文中從學術史的觀點，分為「學術知名度」和「學術影響力」兩方面來分析、解釋其原因。

⁶ 有關小川尚義的著作書目最完整的是李壬癸、土田滋《巴宰語詞典》所載〈小川尚義語言學著作目錄〉（List of Linguistic Publication by Ogawa）（李壬癸、土田滋 2001, pp.385~388）。

在缺乏「學術知名度方面」，洪惟仁（1994）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解釋：（1）日本人對臺灣的漠視；（2）殖民地臺灣的階級隔閡；（3）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視。

戰前臺灣是日本殖民地，戰後日本已經放棄了臺灣，因此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日本一直都沒有關心過臺灣，無論臺灣總督府在臺灣曾經殘忍的殺戮或在建設上、研究上有傑出的表現，日本人都不關心。加上日本人在臺灣也不曾用心培養臺灣人才，臺灣人和日本人之間有一種階級隔閡，臺灣知識份子很少人了解日本人在臺灣研究上的貢獻。至於戰後，統治臺灣的中國人不了解臺灣，也不願了解日本人曾經在臺灣做了什麼研究，長期的戒嚴，把臺灣研究當成禁忌一般，加上日語教育的斷層，戰後受教育的一代幾乎完全不懂中文，因此連臺灣人都不了解戰前日本人在臺灣做了什麼研究。

基於以上三點理由，洪惟仁認為小川尚義的學術知名度所以只限於在臺灣日本人的統治階層之內，不為臺灣學界所知，不為日本學界所知，不為中國學界，當然也不為世界所知，其實無寧說是一種歷史的宿命。

在缺乏「學術影響力方面」，洪惟仁（1994）也提出了幾個可能的原因：（1）日本「支那語」學界的實用主義；（2）中國的漢語語言學無求於日本；（3）臺灣學者的自卑與對於臺灣學術的輕視。

如六角恆廣（1961）所言「戰前日本的中國語一直被壓在實用語的地位，在學校教育之中被排斥在角落裏，不承認其文化性……，在這種情形下，不可能產生科學地研究中國語的學習者與研究者。」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應該從 1937 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通觀戰前的日本中國語學界，可以說沒有足以稱為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可以說日本的漢語學界也是受到高本漢的影響而現代化的。日本學術界的漢語語言學研究可以說是由 1946 年 10 月 20 日「中國語學研究會」成立開始起步的，然後日本的漢語語言學界以更大的視野與努力，作出不遜於中國、或臺灣的，蓬勃、而高水準的研究。⁷

但日本的漢語學界只把眼光放在歐美、中國，即使是六角恆廣，都不知道小川尚義早在 1907 年就發表了具有現代語言學意義的漢語研究論文。

中國現代漢語語言學雖然尚未萌芽，中國傳統的聲韻學到了清末卻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國的漢語學根本無求於日本。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各方面的文化進步神速，中國留日學生絡繹於途，可是戰前，唯獨漢語語言學方面，並無留學生。臺灣留日學生也沒有研究漢語的學者。

最後是價值觀念的因素，臺灣對中國來說一向都只是一個「邊疆」，「邊疆」臺灣

⁷ 二十世紀後期有幾位日本語言學家被中國和臺灣的語言學界所重視，如橋本萬太郎、藤田明保、平山久雄、平田倉司、岩田禮、秋谷裕幸…等人，都是精通英文或華語文而受華人學者所了解的。

的一切不僅中國人不重視，即連臺灣人都不重視，解嚴後重中輕臺的心態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因此臺灣的成就、臺灣的歷史與臺灣學術文化都在被輕視之下艱苦地成長。

總之儘管小川尚義的學術研究無論在研究方法上或研究成果上，在當時世界的漢語學界是頂尖的成就，在東方，那樣的研究也是破天荒的事，可是歷史的捉弄，迫使小川尚義成為無人理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悲劇英雄。

1.4 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上的成就

雖然小川尚義默默無名、毫無影響力，但是站在語言研究史的觀點上，我們不能不給他一個公平的評價。洪惟仁（1994）指出中國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 1928 年趙元任發表《現代吳語的研究》才開始的；至於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 1946 年「中國語學研究會」成立以後的事。可是小川尚義在高本漢的論文(1915)未出現以前的 1907 年即發表了一篇漢字音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不止在中國、日本，即使在歐洲，小川尚義也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最前鋒。

小川尚義的漢語研究文獻主要載於總督府所出版的《日臺大辭典》，其〈緒言〉長達 212 頁，是一篇兼有「漢語音韻史」、「漢語比較方言學」、「閩南語比較方言學」意義的學術論文，〈臺灣語之發音〉18 頁，是一篇簡單扼要的「臺灣閩南語音韻學」論文，附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是第一張臺灣語言地圖，具有「臺灣語言地理學」的意義。

無論就小川尚義做為總督府編修官的任務言或就《日臺大辭典》的功能言，這樣具有學術研究意義的論文刊在一本以實用為目的的辭典中不免顯得有點不搭調。但在當時實用主義的臺灣語言學或日本漢語語言學環境下，這樣的論文除了《日臺大辭典》之外似乎也找不到什麼發表的園地了。

1907 年是小川尚義來臺的第十一年，《日臺大辭典》（1907）的出版大概是小川尚義十年漢語研究的總結。從此之後，小川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南島語，《臺日大辭典》（1931-32）出版之後小川尚義可以說完全轉向南島語研究，結束了漢語、閩南語的研究了。因此要了解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上的成就，從《日臺大辭典》這本辭典就可以窺見大半了。可以說，小川尚義把十年工夫所做的漢語研究成果全部放在這部辭典所附錄的論文上，如果說這些論文是小川尚義的博士論文實在不為過。

但各辭典的〈凡例〉、〈本書編纂之顛末〉提供了辭典的編纂過程，對於小川尚義的在語言調查及辭典編纂方面的貢獻有較詳細的介紹。小川尚義在總督府只是學務部裡

面一名小小的編修官，所有辭典編纂的功勞全部歸功於總督府，如果沒有這些說明我們還不知道這些偉大的學術研究及高水準的辭典編纂工作是出自小川尚義的主持。

以下分別從小川尚義在（1）辭典編輯與閩南語調查、（2）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3）閩南語比較音韻學的研究、（4）臺灣閩南語發音學上的研究、（5）臺灣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等 5 個方面對小川尚義在臺灣漢語研究上的貢獻。

2. 小川尚義的閩南語調查與辭典編輯

日本統治臺灣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臺灣人日語，而要進行臺灣人的日語教育，首先要了解臺灣話，因此日本治臺伊始即開始研究臺灣話，最初的研究是在伊澤修二部長領導進行的，第一部編成的一本《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今已不傳）即是伊澤編纂，其字母符號亦是他創製的，其後陸續改訂出版《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1896）和《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成為臺灣當時官方標準的閩南語音標。

小川尚義 1896 年底抵臺任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課員，他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編纂臺日對照辭典，以為日語與臺語教學上的需要。他到任後一年多就主編完成了總督府出版的第一部辭典《日臺小字典》（1898）。該書〈緒言〉說：

「此書之本國語言（按指日語條項）之選定由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士上田萬年擔任，臺灣語之對譯由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員文學士小川尚義主任其事……」（《日臺小辭典・緒言》pp.1~2）

《日臺大辭典》（1907）〈本書編纂之顛末〉由小川尚義署名，文中記載這部辭典是第一任學務部長（相當於教育部長）伊澤修二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開始籌劃，最初以神津仙三郎為總編輯。為了蒐集閩南語詞彙，神津開始翻譯麥嘉湖牧師（Rev. T. Macgowan，或音譯「馬約翰」）的《英廈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1883），譯了一半因神津病沒，譯事被迫中止。正好小川尚義主編的《日臺小辭典》（1898）已經完稿，小川尚義乃接手後半部的翻譯工作。

可是最優秀的閩南語辭典並非這本《英廈辭典》，而是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所編的《廈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1873），可是小川尚義直到 1898 年譯完《英廈辭典》時才得到這部辭典。《廈英大辭典》是以廈門音為主，兼收漳州、泉州的各種方音，小川尚義認為是非常寶貴的材料，於是 1899 年開始翻譯，1900 年譯完，然後逐詞製成卡片，採摘當時出版的日語大辭典及通用的

口語詞彙五萬餘詞，製成卡片，互相對照。

小川尚義對伊澤部長設計的臺語假名符號也作了一點修訂，1901 年由學務課出版了《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以後總督府出版的辭典包括《日臺大辭典》（1907）都採用這種新訂的標準符號系統。

但是這部辭典並不只是「翻譯」的工作，小川尚義指出，能夠直接用於本辭典對譯的不過三四成，其餘日語詞彙所不能對譯於閩南語者，必須一個詞一個詞詢問臺灣人。參與對譯工作的臺灣人有囑託潘濟堂、雇員白陳發、蔡啟華、莊長命等。

小川尚義在〈凡例〉（p.56）中交代其〈緒言〉語言比較的語料的來源說，除了引用翟理斯《華英大辭典》所載的六種中國方言語料和朝鮮、安南等語料之外，在「廈門、漳州、泉州等語之發音乃據編者（即小川尚義）之考案。」

小川尚義所謂的「考案」，意思應該是根據文獻（主要是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記載與自己的調查。

小川尚義出版了《日臺大辭典》（1907）之後，隨即出版了《日臺小辭典》（1908），可以說是《日臺大辭典》的袖珍本。小川尚義在序言說：

「余曩承臺灣總督府之命編纂《日臺大辭典》，世人病其浩翰，希望更為簡約者，總督府乃令予作此簡約之物，命書肆刻為袖珍本。」

小川尚義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主編了世界上最大的閩南語口語辭典《臺日大辭典》（1931-32）。總督府總務局長人見次郎在《臺日大辭典》序言說：

「相對於日臺對譯辭典，臺日對譯辭典之必要，恰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於是日臺大辭典刊行之後，立即著手編纂臺日大辭典。經二十年來之調查研鑽，終告完成，公刊於茲。」

本辭典出版時小川尚義已經擔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但仍擔任本辭典的主編，《臺日大辭典·凡例》說：

「本書之編纂以元總督府編修官，現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總督府囑託小川尚義為主任，其第一期事業材料蒐集及譯語由編修書記平澤平七擔當之，雇員潘濟堂、蔡啟華、陳清輝輔助之。第二期事業追加材料，譯語精選及語源調查由囑託岩崎敬太郎擔當之，雇員陳清輝、杜天賜、江心慈、黃銘銓輔助之。」

緊接著《臺日大辭典》的出版，總督府立即出版了《臺日小辭典》（1932），然後又於 1933 年四月起便開始著手編纂《新訂日臺大辭典》。依《新訂日臺大辭典》上卷⁸（1938）的說明，這部辭典的編纂仍以小川尚義為「首班」。1936 年小川尚義雖已告

⁸ 《新訂日臺大辭典》的上卷 1938 年出版，當時皇民化運動（1937-1945）已經進行了一年，也許為了時勢所趨，下卷一直沒有出版，傳言說書稿於戰爭中送往日本途中，輪船被炸，沉入海底。

老還鄉，但仍為《新訂日臺大辭典》校對。

小川尚義 1896 年渡臺，1936 年回日本，在臺 40 年間幾乎與臺語辭典的編纂相終始。總督府的閩南語辭書編纂事業一直沒有間斷，小川尚義也一直擔任著相當於總編輯的職務。

這些辭典編纂的語料是如何取得的呢？小川尚義雖然坦承最初是翻譯麥嘉湖的《英廈辭典》（1883）和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但用於辭典編纂的語料卻是在臺灣蒐集的，上舉總督府所聘請的台灣人囑託（相當於專案助理）潘濟堂、雇員白陳發、蔡啟華、莊長命、陳清輝、杜天賜、江心慈、黃銘銓等可以說是小川尚義閩南語調查的發音合作人。

小川尚義當然也參考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但絕不是照抄。這一點可以從兩個簡單的事實來證明：

一、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記載福建的漳州話音系有一個特徵，就是前元音有 *e* 和 *ɛ* 的對立，但是臺灣的漳腔方言只有少數擬聲詞及輕聲詞有開口的 *ɛ*，實詞部分已經沒有 *e* 和 *ɛ* 的對立。小川尚義所主編的辭典所反映的都是臺灣音，沒有像閩南漳州音系 *e*~*ɛ* 一樣的對立。

二、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記載泉州音有一個 *öm* 韻母，記了兩種變體，如「蔘」收泉音 *sm[sim]/söm[səm]*，這兩種變體在現代鹿港腔都還同時聽得到，有人說成 *sm[sim]* 有人說成 *söm[səm]*，但臺北地區的泉腔沒有這種變體，只說 *sim*（漳腔說成 *som*）。《臺日大辭典》有討論到這個韻母，並做了音值描寫（參見本文 5.3 節），但是蒐羅方言變體最豐富的《臺日大辭典》都也沒有收 *öm* 韻母的任何字詞。這個變體只有台灣西部的「海口腔」才有，小川尚義恐怕沒有聽過「海口腔」，他所有為了辭典編纂所做的閩南語調查都是在臺北做的，所以雖然《廈英大辭典》有 *öm* 韻母，小川尚義也可能真正調查過泉州話，但因為小川尚義不知道台灣話有 *öm* 韻母，所以不收。

由此可見，《臺日大辭典》所紀錄的是當時臺灣北部閩南語的實際語音。不但語音如此，詞彙更是如此，《臺日大辭典》厚達 1916 頁所收的九萬餘個詞彙也都是當時蒐集到的口語詞彙（包括少數口語出現的文言詞彙或借自日語的新詞）。這個事實顯示，小川尚義所編的臺語辭典包括《臺日大辭典》不是規範性的實用辭典，而是具有描寫語言學價值的口語辭典。

就其內容而言，它不但是一部「詞典」，並收集了許多成語、諺語，還簡單地紀錄了博物學的、民俗文化上的意義。《臺日大辭典·凡例》說：

「譯語之中有關動物、礦物之詞彙採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川安市之調查、有關植物採錄新竹州地方技師島田彌市之調查，有關藥物疾病採錄杜聰明之調查。」

還有《臺日大辭典》第一期事業編修書記平澤平七是台灣民間文學家，曾編纂《台灣俚諺輯覽》、《台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1917）辭典中許多有關諺語、民間文學、民俗方面的紀錄應該是他的貢獻。

舉例說（以下假名注音改為台羅拼音）：

（1）jit-jit-tshun 日-日-春：日日草、日日花。（夾竹桃科，以其莖、葉之汁液和以鹽水作為含嗽料可治咽喉加答兒）

（2）jit-thâu-tuann 日-頭-單：訂婚後男方送女方記載【送定 sàng-tiānn】後至結婚日應該送什麼禮數的日程表。

（3）jit-thâu 日-頭：日、太陽。……【送日頭 sang3jit8thau5】男方送【日-頭-單 jit-thâu-tuann】給女方。~~赤焰焰隨人顧性命（~~tshiah-iānn-iānn suí-lâng kò sinn-miā）= 調艷陽高照，各人自顧各人生活。……

這部辭典的收詞相當完整，註釋精確，可以說是日治時代台灣閩南語的全紀錄，同時也反映了當代的台灣文化，可以說對於台灣語言與文化發展史的紀錄、保存、研究具有非常巨大的貢獻。

3. 小川尚義的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

小川尚義的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見於《日臺大辭典・緒言》第一款「南部福建的特徵」（〈緒言〉pp.6~163）。這是一篇兼有「漢語音韻史」、「漢語比較方言學」意義的論文，也是〈緒言〉中最精彩的部分。在這裏，小川尚義完全採用十九世紀當時歐洲盛行的歷史比較音韻學方法研究漢語。稍晚瑞典音韻學家高本漢也以同樣的方法研究漢語音韻而得到博士學位（1915）。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曾經對於小川尚義與高本漢在漢語音韻學研究的成就做了詳細的比較，本文不擬在此贅述，但就小川尚義在漢語比較音韻學和中古音擬測方面的成就做一點論述。

3.1 小川尚義的漢語比較音韻學

雖然小川尚義和高本漢都是最早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進行漢語方言比較與中古音擬測的人。但是兩者比較的目的與方法不盡相同。傳統的漢語音韻學研究都只研究漢字音，高本漢也只做到了單字音的調查研究，其漢語方言學的研究就是為了古漢語單字音的擬測服務的，這個研究方向長久地限制了漢語方言學的發展。直到二十世紀後期，漢語方言學界才逐漸注意到詞彙、語法、

方言類型學、方言地理學、方言社會學的問題，而萌芽了真正的漢語方言學。

可是小川尚義一直都是結合了音韻與詞彙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語音、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並非為了擬測古漢字音服務的，而是反過來，先站穩了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然後進行漢語比較方言學和閩南語比較方言學以及閩南語詞彙、語音的研究的。

這一點可以從〈緒言〉的結構看出來：

第一章：臺灣的語言

第二章：支那的語言

第三章：臺灣的支那語（漢語）

第一項：客人語（客語）

第二項：南部福建語（閩南語）

第一款：南部福建語的特徵

一、語頭音（聲母）的特徵

1. 唇音：

ア、(p) 音 韻鏡「幫」母 (p) 音。廈門音多唸成 p，也有極少數字唸成 p'。

列表比較「邦」、「本」、「波」、「博」四字的廈門、福州、客人、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日本（包括日語漢音及吳音）等 12 個語言的漢字音。

イ、(p') 音 韻鏡「滂」母 (p') 音。廈門音多唸成 p'，也有極少數字唸成 p。

列表比較「篇」、「派」、「漂」、「胞」四字的廈門、福州、客人、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日本（包括日語漢音及吳音）等 12 個語言的漢字音。

ウ、(b) 音 韻鏡「並」母 (b) 音。廈門音多唸成 p 音。支那語之中有此 b 音的只有上海、寧波。

列表比較「皮」、「蒲」、「便」、「僕」四字的廈門、福州、客人、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日本（包括日語漢音及吳音）等 12 個語言的漢字音。

.....

請注意他的漢語方言比較和中古音構擬是放在第一款「南部福建語的特徵」之內。可見對小川尚義而言，擬音只是附帶的目的，小川尚義只是以中古音為座標，主要目的是比較閩南語各方言和其他的漢語（福州、客家、廣州、上海、寧波、溫州、北京、南

京)及域外(安南、朝鮮、日本、梵語)漢語共 12 種語言的漢字音。比較的語言中日語又分為吳音、漢音,閩南語以廈門音為主,如果閩南語內部有方言差,再加上漳州、泉州、汕頭三種方言,廈門音有文白異讀時也同時並列「廈讀」(廈門文讀音)或「廈俗」(廈門白話音)。實際比較的語種或變體有 17-18 種之多。所有的比較都以閩南語為中心,從比較中看出「閩南語的特徵」。

小川尚義在〈凡例〉中交代其〈緒言〉作為語言比較的語料來源說:

「緒言所舉的中國各種語言之中,福州、客家、廣州、溫州、寧波、北京及朝鮮、安南等語音材料據翟理斯(Giles, Herbert A)的《華英大辭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⁹(1892),但廈門、漳州、泉州等語之發音乃據編者(即小川尚義)之考案。又漢音、吳音之假名注音根據太田方《漢吳音圖》而做少許變更。」(〈凡例〉pp.56)

雖然如此,小川尚義並非照抄原典,而是修改為他自己統一的羅馬字音標,〈凡例〉提供了一個對照表,以見編者的音標系統和原文的差異。可見,小川尚義作為比較語言學的材料不是原素材,而是經過精製過的,這一點和高本漢採用南方漢語的過程一樣,不過如洪惟仁(1994)所指出的,高本漢在轉寫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少錯誤。

小川尚義在〈緒言〉中比較的音韻範疇包括:

- 一、語頭音(聲母)的特徵
- 二、語尾音(韻尾)的特徵
- 三、韻(韻母)的特徵
- 四、音調(聲調)的特徵

最後將各種漢字音依韻鏡的分類與 12 種語言各種語種的漢字音對應關係列成三個比較表:〈語頭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言聲母的對應規律;〈語尾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言韻尾的對應規律;〈韻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言韻母的對應規律。這些比較使人可以對於古今音、南北音的差異有一個概括的了解,並可一目瞭然地看出「閩南語的特徵」。

細考其比較的方法及比較結果有幾點令人贊嘆的成就:

- 1) 以《韻鏡》為比較的座標:

小川尚義在緒論中說:

「……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蓋韻鏡之音雖未必表示中國語之最古音,但其音韻之種別頗為精密,在比較上最為方便……。」(《日臺大辭典》p.6)

《韻鏡》可以說是《切韻》的單音字表,清楚地顯現出《切韻》的音系,可惜在中

⁹ 翟理斯所載六種方言資料其實是 Parker 所提供。這些資料也是高本漢進行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語料。

國失傳已久，卻在日本保存了下來，被小川尚義運用到他的比較音韻學研究。高本漢在寫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時還沒有見過《韻鏡》，他中古音材料主要是康熙字典所引《廣韻》的反切及其卷首的《等韻切音指南》、《切韻指掌圖》。高本漢在書中引用了 Mapero 關於 Yun-king 的介紹，卻把漢字寫成《韻經》(p.34)，譯本才改成《韻鏡》(p.22)。

2) 利用當代語音學術語

小川尚義討論音韻學時雖然也引用《韻鏡》的傳統術語，但是討論語音問題時所採用的卻是西方語音學術語的漢譯，並加注假名音譯。如：

語頭音（聲母），旁注イニシアル（initial）

唇音，旁注ラビアル（labial）

舌尖音，旁注デンタル（dental）

.....。

由此可見，小川尚義不是採用傳統漢語音韻學的模式，而採用西方當代語音學或音韻學的模式來進行他的研究。

3) 詳論現代漢語聲調與聲母關係

上引〈緒言〉第四段「音調的特徵」詳細討論：

（1）四聲分化

〈緒言〉（pp.134~135）觀察到古四聲演變到現代方言分化為陰、陽（或稱上、下）二類，或為四聲（北京、四川、貴州、中部支那），或為五聲（南京、揚州），或為六聲（客人去聲不分陰陽、大冶入聲不分陰陽），或為七聲（廈門、漳州、福州上聲不分陰陽，泉州去聲不分陰陽），或為八音（汕頭、潮州），或九聲（廣州），並列表與中古四聲比較（pp.134 及 136~147），證明四聲分化與古音清濁的關係〈緒言〉。他所舉的方言有些不在他的聲母比較表內（如揚州、大冶、潮州），可見他所比較的方言不是他所擁有的全部語料，只是一部分。

（2）濁音清化與送氣

〈緒言〉（pp.135~136）又列表詳細討論各個方言濁音清化之後，聲調陰陽與聲母送氣的關係。他說《韻鏡》的濁音客語通常送氣，南京、北京陽平送氣，廣州陽平全部及部分陽上送氣。廈門、福州通常陽平、陽上有送氣音。有關客語、北京、廣州的論斷比較精確，廈門、福州部分似乎不太精確，據統計閩南語全濁字清化約四分之一送氣、四分之三不送氣。

（3）濁上歸去

又討論泉州保存陽上，但廈門、福州濁上歸去；廈門有些次濁字有文上白去的現象（例如「雨」ú文上、hōo 白去）。

在中國還在清朝的時候，小川尚義就已經做了這麼詳細的漢語方言對應規律的研

究，未免令人贊嘆。¹⁰

3.2 小川尚義的中古音擬測

雖然古音擬測不是小川尚義的主要目的，可是〈緒言〉所進行的中古聲母的擬測卻是他的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他以十二種語言的漢字音比較進行中古音擬測的研究方法和高本漢一樣都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傳統方法，這種方法無疑地是傳承自他的老師上田萬年，上田萬年是日本第一位留學德國學習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語言學家。

小川尚義的漢字音比較既以《韻鏡》為古音的參考座標，已經足夠做為比較的基礎架構。不過《韻鏡》的音系只是一個音類系統，而不是音值，無法據以理解古今音的變化或現代方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小川在容易擬測的中古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作了擬測，作為理解今音的參考，並非沒有必要。

這個古音擬測是和漢字音比較研究同時進行的，只是擬音並非小川文的目的，所以小川尚義對於擬音沒有做繁複的論證與說明。依照高本漢的標準，只有擬音而沒有論證只能說是一種「猜度」，而不是「專家的科學」¹¹。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小川尚義的擬音可能被高本漢批評為只是一種「猜度」。可是我們以為小川的情形並不像高本漢所批評的前人那麼糟糕，因為小川尚義的擬音都是伴隨著一個現代漢字音對照表的，對照表所羅列的資料本身就會說話，小川尚義所做的龐大的現代漢字音比較本身就可以作為他的擬音的很好的證據。何況小川尚義往往會簡單地說明擬音的理由。譬如他把二等知系和二等照系擬為捲舌音即說明是根據梵語對音；他把喻三擬為-w、喻四擬為-y 即說明是根據安南譯音。還有他把全濁音擬為：並 b, 定 d, 群 g, 從 dz, 邪 z, 床 dz, 床 j, 禪 zh[ʒ] 是根據吳語（但他沒有擬成送氣音）。他對於沒有自信的擬音（如敷母為唇摩擦音 f 送氣）也不強作解人，注 “?” 以示存疑。可見小川尚義的擬音說明雖然簡單，也是有相當根據，而且很謹慎的。

擬音說明的詳略和擬音的正確與否沒有關係，像高本漢做了那樣冗長的擬音說明，也並不能保證擬音一定正確。雖然他對於中國音韻學的研究像是投了一顆原子彈，結束了傳統音韻學的時代。可是他的擬音卻一個一個被後人修正，甚至到了體無完膚的地

¹⁰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這張表所舉的語料都沒有詳細註明聲調，方言之間聲調的差異及規律性沒有正確的標示，這也許是調值描寫技術與調類標示的困難所造成的困難吧？高本漢也沒有辦法克服，因而所有語料都沒有標示聲調，甚至也不標示入聲喉塞音。小川尚義至少還用-h 標記了入聲喉塞音。

¹¹ 譬如有關曉、匣二紐的擬測，Maspero 的意見和高本漢相同，可是高本漢並沒有一句讚美之詞，高氏批評說：「Maspero 定曉母為清的舌根摩擦音 x，匣母為相配的濁音 γ。他對這種說法並無給一個理由，所以仍然算是一種猜度。我們在未徹底考究這個問題以前不能接受他。」（《中國音韻學研究》p.272）

步。洪惟仁（1994）引用李方桂等學者的批評舉出勞勞大者有三點：

- 1) 喻母不分為喻_三、喻_四二類。
 - 2) 照_二系擬為捲舌音，知系卻擬為舌面音，顯然不一致。
 - 3) 根據吳語濁音送氣（應是清音濁流）的性質，堅持認為中古全濁聲母送氣。
- 而這三點，小川尚義都和後來的學者意見差不多：

- 1) 根據《韻鏡》，將喻母分為喻_三、喻_四二類。
- 2) 根據梵語，把照_二系和知系都擬為舌尖裏音（捲舌音）。
- 3) 和其他的音韻學家一樣沒有把中古全濁聲母擬為送氣。

小川尚義有一個〈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比較三十六字母、等第及其擬音。茲參照其內文之說明加上《韻鏡》之音類名稱及其所擬現代語言學名稱，符號亦改為 IPA，重新製如下表：

小川音類名	韻鏡音類名	清	次清	濁	清濁
唇音	重唇音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唇摩擦音	輕唇音	非 f	敷 f' (?)	奉 v	微 v ⁿ
舌尖音	舌頭音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舌尖音	舌齒音				來 l
舌尖裏音	舌上音	知 t̪	徹 t̪'	澄 d̪	娘 ŋ
齒音	齒頭音	精 ts	清 ts'	從 dz	
舌尖音	細齒頭音	心 s		斜 z	
舌尖裏音	正齒音	照 _二 tʂ	穿 _二 tʂ'	牀 _二 dʒ̥	
舌尖裏音	細正齒音	審 _二 ʃ		禪 _二 ʒ̥	
舌面音	正齒音	照 _三 tʃ	穿 _三 tʃ'	牀 _三 dʒ	
舌面音	細正齒音	審 _三 ʃ̥		禪 _三 ʒ	
舌面鼻音	齒舌音				日 ʒ ⁿ
舌根音	牙音	見 k	溪 k'	羣 g	疑 ŋ
喉頭音	喉音	影	曉 h	匣 h	
唇半母音	喉音				喻 _三 w
舌半母音	喉音				喻 _四 y

上表中分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穿牀審禪為二類，定照二為捲舌音，照三為舌面音；分喻母為二類，定喻三為唇半母音，喻四為舌半母音，都是很有見地的。

和李方桂（1971）所擬的中古音系統比較，除了曉、匣、喻三母之外，其餘沒有什麼差別。小川尚義唯一的錯誤是把匣母擬為 *h*，也就是弱的 *h*。小川尚義是日本人，竟不會利用日本吳音以考證曉、匣二母的音讀，令人扼腕。而總結高本漢的成就，高本漢在聲母擬音方面真正的成就只是論證了 Maspero 有關曉：*x*、匣：*ɣ* 兩母擬音的意見。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有關聲母的擬音佔了 198 頁之多(pp.239-436)，才得到這一點小成就，未免令人意外。

古音擬測雖然不是小川尚義的目的，他對於擬音的理由也只是輕描淡寫，沒有長篇累牘的論證。可是他是最早成就了最接近李方桂較合理的聲母擬音的現代漢語音韻學家，使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真知灼見。

4. 小川尚義的閩南語比較音韻學研究

小川尚義的閩南語比較音韻學可以分兩方面來討論，一是閩南語「文白異讀」的比較，一是閩南語「方言異讀」的比較。茲分述如下：

4.1 閩南語文白異讀的比較

小川尚義有關閩南語「文白異讀」的比較在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緒言〉pp.163~193）。所謂「俗音」就是白話音之義，不過他卻往往和俗讀、訛變、同源詞、破音字、訓用音、假借音等概念混淆了。他分類舉了許多文白不規則對應的例子（〈緒言〉p.190~193），不過其中很多例子其實不是同一個詞素：

「妓」*kī* 唸成 *ki* 是文讀音的「俗讀」。「琵琶」*pī* 唸成 *gī* 等是訛變。

「公」*kong* 文、*kang* 白，訛讀 *káng*。*káng* 用於「牛犂」*gû-káng*，「羊犂」*iû-káng*，是雄性之義。其實 *kang* 和 *káng* 只能說是同源字，不能說是訛變。有些是漢語固有的破音字，如「肚」*tōo* 文、*tóo* 白，也跟「俗音」無關。

另外有些音是訓用音，如「穿」*tshuan* 文，*tshīng* 白。穿衣服的「穿」其實是訓用字，有人說本字是「頌」，*tshīng* 不能算是 *tshuan* 的白話音，因此也無所謂「訛變」。

不過有些例子的確值得研究，如「籠」*lông* 文、*láng* 白（還可以舉「雞籠」*ke-láng* 的「籠」*láng*），「鈍」*tūn* 文、*tun* 白等的確是不規則對應。

文白異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小川尚義對於閩南語的本字與用字顯然研究得不是很深入，但是也已經看出許多問題了，他提供的現象很值得後人再深入分析。

小川尚義說：

「廈門音很多情形有讀書音與俗音兩讀，通常以為俗音是讀書音的轉訛，可是有時不能不認定俗音反而保存了古形。」（〈緒言〉p.163）

他在比較聲調的時候又指出：

「廈門（閩南語）的俗音雖然往往和讀書音不同，但音調通常一致。不過也有音調訛變的情形。」（〈緒言〉p.190）

這些話很有見地，可惜他並沒有好好地發揮。

4.2 閩南語方言異讀的比較

小川尚義的閩南語方言異讀研究載〈緒言〉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pp.193~212）。他把閩南語分成廈門話、漳州話和泉州話三方言，而以廈門音為標準。方言的敘述分為二節，第一節「漳州話及其類似方言」；第二節「泉州話及其類似方言」分別介紹閩南語的各種方言。但是無論是那個方言，都是以廈門音為軸心，第一節比較漳州音和廈門音的差異，兼談漳浦音的特色，並約略的談到其他漳州系方言如平和、海澄、南靖、龍巖、長泰、詔安次方言的特色。第二節比較泉州音和廈門音的差異，其次談到同安音的特色，最後約略地提到灌口音的特色。

漳州音、泉州音並不是個別和廈門音不同，有許多音類三個方言都不相同，特別是央元音韻類，三個方言都不相同，在第一節比較了漳州音和廈門音的差異時不得不起比較泉州音，等到第二節比較泉州音和廈門音的差異時只好參照第一節的比較，這是小川尚義論文結構上產生的問題。

不過就內容而言，小川尚義的貢獻有幾點可以討論：

1) 語料來源

小川尚義作為閩南語方言比較的語料絕大多數都已經見於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小川尚義的語料可能大多數都採自杜嘉德的辭典，並且加以深入的研究，但是詳細比較小川尚義的語料，有幾點不能理解的差異。

(1) 杜嘉德辭典收了一個泉州音韻母/öm/（-erm）韻母，相當於《彙音妙悟》的〈箴〉字母（*-erm），和〈恩〉字母（*-ern）、〈生〉字母（*-erng）構成一個關聯系統。但是小川尚義提過這個這個韻母，《臺日大辭典》卻不收這個韻母。小川尚義沒有提到他的閩南語語料來源，如果小川尚義完全依賴杜嘉德辭典，怎麼會把這個重要的韻母遺漏了呢？

(2) 小川尚義把所有《彙音妙悟》屬於〈杯〉字母（-ue）的唇音白讀字，漳音唸-e，廈音-ue，泉音都標成-ere，如「八」漳音 peh，廈音 pueh，泉音 pereh。洪惟仁《『彙

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154）比較漳泉音的結果認為《彙音妙悟》屬於〈杯〉字母（-ue）的唇音白讀字古泉州音應該屬於〈雞〉字母（-ere），「八」的古代泉州音應該是*pereh，但因為聲母唇音的同化，在 200 年前的《彙音妙悟》時代已經變成 pueh，因而歸入〈杯〉字母。現代泉州音都唸成 pueh，將來沒有聽過唸成*pereh 的方言。假定小川尚義真正收集到 pereh，表示在 100 年前台灣還保存著這個古代泉音變體。但是這個假設也有疑問，因為假定小川尚義真正蒐集到《彙音妙悟》屬於〈杯〉字母（-ue）的唇音白讀字還保存央元音的變體，那麼應該在《臺日大辭典》收入這些變體，可以查《臺日大辭典》「八」只收 pueh 廈、peh 漳；「買」bué廈、bé漳；「賣」buē廈、bē漳，完全沒有-ere 韻類的唇音字。難道小川尚義真正聽過「八」*pereh 這樣的變體？在那裏聽到的？如果是在台灣聽到的，為何不收入《臺日大辭典》？

(3) 小川尚義和杜嘉德辭典收集的方言資料不同。杜嘉德的方言語料有泉州、漳州、台灣(Formosa)、永春、惠安、灌口、南安、漳浦、同安、長泰（參見杜典‘Explanation of Abbreviation and of Peculiar Marks’）。但小川尚義在本款中提到的方言不止這些方言，還有大田、平和、海澄、南靖、龍巖、長泰、詔安，杜典沒有資料。小川對於這些方言的描寫雖然簡略，但卻是相當扼要而合乎事實的。譬如他提到平和西部有客語；海澄雖然大體上接近漳州話，但因接近廈門，受到廈門音很大的影響；龍巖雖然大體上接近漳州話，但也見客語通行；長泰話舊屬泉州府，故有泉腔特徵；詔安有些地方類似汕頭話之類。這些紀錄，如果沒有調查資料或者親身調查是寫不出來的。

2) 系統化比較

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雖然語料豐富，但是沒有什麼研究，唯一有一點方言比較意義的敘述是附錄中三頁非常簡略的敘述（Appendix, pp.603~610）。但是小川尚義卻花了二十頁（〈緒言〉pp.193~212）作了非常有系統的方言比較，整理出一些對應規律出來。

3) 比較的座標

小川尚義作為方言比較的座標仍然採用《韻鏡》。對於不懂閩南語韻書系統的讀者，採用《韻鏡》或《切韻》作為比較的座標比較方便於理解，但是對於閩南語方言學家而言卻非常不便，因為《韻鏡》是中古音系，這個系統到了現代閩南語作了很激烈的重編，不如參照《彙音妙悟》和《十五音》容易理解閩南語音類，與方言變異。

5.小川尚義的臺灣閩南語發音學研究

小川尚義的描寫語言學研究主要見於《日臺大辭典》〈台灣語的發音〉，又方言音

值及音韻之描寫散見於其他文章之中，小川所主編的每一本辭典都附有假名音標符號說明與發音說明，但都不如本文詳細而精確。值得提起的有以下幾點：

5.1 對於聲母之觀察

關於〈入〉字頭的音值，小川尚義有一段非常精確的描寫。他在〈緒言〉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第二節第 20 條中說：

「廈門、漳州音聲母唸成[z]的，泉州、同安往往唸成[dz]或[l]。」

這個描寫相當精確，筆者對於台灣閩南語的方言做過許多調查，可以印證小川尚義的觀察。

5.2 對於介音的觀察

小川尚義解釋台灣話的-i-介音時說：

「イア(ia)、キウ(kiu)、シオ(sio)等音節的 i 母音通常是精確地發音，跟普通日本語中的ヤ(ya)、キヤ(kya)、ショ(sho)不一樣。」（〈台灣語的發音〉p.2）

意思是，台灣話的 i 介音是一種元音，日語的 y 介音是一種半輔音。我們現在爭論閩南語的介音到底應該屬於韻母或者屬於聲母的一部分，小川尚義已經給了答案：日語的介音 y 屬於聲母，而台灣話的 i 介音屬於韻母的一部分。他把這個觀念落實在音標符號上。比如兩個語言類似的音，標音法不一樣，台語標成イア(ia)，但日語標成ヤ(ya)。相對的關於 u 介音，沿襲教會羅馬字的觀念，ua 標成オア(oa)、ue 標成オエ(oe)，不標成ワ(wa)或ウア(ua)、ウエ(ue)，大概也是要強調其「元音性」。

5.3 對於韻母的觀察

關於閩南語的元音，台灣音、廈門音有六個，和日語的 5 個基本元音不同之處有二：一、台灣話有兩個後中元音的對立，元音較關的 o 用ヲ標示，元音較開的 oo[ɔ]用オ標示。二、日語和台語都有 u 元音，但日語的 u 是展唇的[ɯ]，至於台灣話，小川尚義說明「台灣話比日語的 u[ɯ]狹而唇端突出。」（〈台灣語的發音〉p.3）

關於過渡音，小川尚義也有觀察到，他說音節性鼻音韻母如クン(kng)、ツン(tsng)、スム(sm)和聲母之間通常會插入一個極短的 ü[i]，但在 hng、hm，氣息不經口腔（直接由鼻腔）流出。（〈台灣語的發音〉p.3）在所有小川尚義的辭典及論文中只有這裏

提到 sm[sim]（相當於 sōm[səm]）這個變體，並作了音值描寫。

5.4 對於聲調的觀察

台灣話有七個聲調，但是名義上仍稱為「八聲」或「八音」。小川尚義對於這七聲的音值有詳細的描寫，所使用的調名也沿襲閩南語音韻學通用的名稱，不說陰、陽，而稱上、下。對於音階的描寫，不像近代漢語學家一律採取五階制標示調階（在趙元任發明五階制標示法以前，西方學者也沒有採用五階制的），而採三階制標示調階。以下是他的調值描寫，附加筆者使用的數字式，以 1 表低調、2 表中調、3 表高調、0 表促調急收，對照如下：

上平（陰平）：高調而平直[33]。

上聲：始高調而急降，音尾微弱[31]。

上去（陰上）：低調而長，音尾微弱[11]。

上入（陰入）：中調急速微降，音尾短促忽然止息[210]。通常有一個密閉音-k、-t、-p 終結，也常以後頭密閉音將結。

下平（陽平）：始低調，漸次上昇[12]。但泉州音始中調急昇，音尾強烈[23]。

下去（陽去）：中調長而平直[22]。

下入（陽入）：高調如上平而短促。音尾急速止息[30]。但漳州音如下去中調急止[20]。通常有一個密閉音-k、-t、-p 終結，也常以喉頭密閉音將結。

這個描寫和筆者自《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1985）採用的三調階描寫完全不謀而合。

5.5 對於連音變化的觀察

連音變化的描寫見於「音便及轉調」（〈台灣語的發音〉p.11）。「音便」就是連音變化的意思，在小川尚義的觀念裡，連讀變化或變調都算是同一範疇的語音現象。在這一節裡小川尚義也有令人贊嘆的敏銳洞察力。舉例如下：

1) 音便

a 塞音韻尾濁化

小川尚義說入聲塞音韻尾後接元音、h-聲母、濁聲母、鼻音聲母時都會變成濁音。如：

(1) -p→-b

例：十一 tsáp-it→tsáb-it；雜貨 tsáp-huè→tsáb-huè；十六 tsáp-lák→tsáb-lák；十五 tsáp-gōo→tsáb-gōo；業命 giáp-miā→giáb-miā。

(2) -t→-l

例：結案 kiát-àn→kial-àn；不孝 put-hàu→pul-hàu；別人 pát-lâng→pál-lâng；別日 pát-jit→pál-jit；一碗 tsit-uánn→tsil-uánn。

(3) -k→-g

例：目油 bák-iû→bág-iû；百合 pik-háp→pig-háp；惡人 ok-lâng→og-lâng；目眉 bák-bài→bág-bài；竹林 tik-nâ→tig-nâ。

b 輕讀詞的傳韻

小川尚義指出小稱詞尾「仔」之前的塞音韻尾不但產生濁化，並且所有的韻尾接無聲母的輕聲詞如「仔」-á、「的」--ê 時都會把韻尾轉化為其聲母。如：

(1) 小稱詞「仔」á

-p 濁化為 b，然後傳韻給「仔」á，如：盒仔 áp-á→áb-bá。

-t 濁化為 l，然後傳韻給「仔」á，如：賊仔 tshát-á→tshál-lá。

-k 濁化為 g，然後傳韻給「仔」á，如：鑿仔 tshak-á→tshag-gá。

-m 直接傳韻給「仔」á，如：柑仔 kam-á→kam-má。

-n 直接傳韻給「仔」á，如：巾仔 kun-á→kun-ná。

-ng 直接傳韻給「仔」á，如：蔥仔 tshang-á→tshang-ngá。

(2) 輕聲詞

-n 直接傳韻給「的」--ê，如：新的 sin--ê→sin--nê

-t 濁化為 l 傳韻給「的」--ê，如：迄今 hit--ê→hit--lê；一下 tsit-ê→tsit-lê

c. 後向同化

小川尚義指出：-t 接 k-, kh-, g-、s-、p-, b-時韻尾後向同化為其輔音。如：佛公 pút-kong→púk-kong；出外 tshut-guā→tshug-guā；出世 tshut-sì→tshus-sì；捌字 bat-jī→baz-jī；織布 tsit-pò→tsip-pò；虱母 sat-bú→sab-bú；出名 tshut-miā→tshum-miā；不雅 put-ngá→pung-ngá……。

d. 同音異化

小川尚義指出：重疊詞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會變成 l，如為鼻化元音音節則變成 n。如：食食 tsiáh-tsiáh→tsiáh-liáh；燒燒 sio-sio→sio-lio；搬搬 puann-puann→puann-nua；聽聽 thiann-thiann→thiann-nia。《臺日大辭典》對重疊詞的這種連音變化都不憚收羅。

e. 縮讀

小川尚義指出：兩個字有些會結合為一個音節。如：

四十九 sì-tsáp-káu→siap-káu；二十二 jī-tsáp-jī→jiáp-jī；啥人 siánn-lâng→siàng；
共人借 kā-lâng-tsioh→kāng-tsioh；予人拍 hōo-lâng-phah→hōng-phah；
拍毋見 phah-m̄-kinn→phàng-kinn；飲一下 lim--tsit-ē→lim--tseh

2) 轉調

轉調即通俗所謂的「變調」。小川尚義解釋說：「出現在慣用語之前的字通常會失去固有的聲調，轉為其他的聲調。」他的字典對於變調有特別的符號，讀變調的字後面加上一個‘ˊ’。

a. 小川尚義的轉調規則描寫也是採取通俗的轉調法，即上平轉下去；上聲轉上平；上去轉上聲（但在「仔」之前轉上平）；上入轉下入；下平轉上去（案：小川描寫的是泉腔，漳腔轉下去）；下去轉上去；下入轉上入。

b. 他舉例了四句話說明每一個字在慣用語的上字或下字聲調的變化。如：

水-車 車-水；蚊-煙（蠓薰） 煙-蚊（薰蠓）

風-鼓 鼓-風；雞-罩 罩-雞

他又舉了一些同形異構體說，同一個字變調和不變調常常有不同的意思。如：

風 吹（風吹著） 風-吹（風箏）

日 照（陽光照射）日-照（日晷）

c. 輕聲

小川尚義指出：有些慣用詞意義弱化，變成助詞，會變成去聲的聲調，但其上字（前字）則讀固有聲調（本調），輕聲詞附加‘=’表示。如：

日=時 jīt--sī；入=來 jīp--lài；新=的 sin--ê。

由上面看來，後世閩南語音韻學上提到的音值描寫與音韻規律，小川尚義大都已经提過了，有些音值觀察之細膩（如連讀變化），分析之精當（如三調階制的調值描寫），甚至比大部分的現代閩南語音韻學家更高明。

6. 小川尚義的臺灣語言地理學研究

小川尚義在《日台大辭典》也附了一張〈臺灣言語分佈圖〉（見【附錄一】）。

有關這張地圖的製作沒有任何說明，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根據什麼資料、怎麼繪製的。但這張地圖製作得非常精密，我們拿來跟航照圖套疊，發現出入極微，這樣的地圖不可能出自一個語言學家之手，一定是配合總督府專門負責台灣土地測量的單位製作的。

重要的是這張地圖是有史以來第一張台灣的語言地圖。地圖把支那語(漢語)分成漳

州、泉州、客人三類，番語(南島語)分為泰雅、賽德克、布農、鄒、查里仙(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今稱達悟)、賽夏、熟番(平埔族)十一種。除熟番散佈漢語區內，其餘各語各有清楚的分佈區。雖然地圖沒有署名，但是能夠繪製這樣的語言地圖的人，除了小川尚義不可能有第二人。

至於他的語言資料，第一、最方便取得的應該是台灣總督府 1905 年國勢調查，當時的戶口普查調查到常用語言，但是比較細緻的方言區分應該是根據祖籍或民族別資料。當時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大體上和祖籍一致，祖籍或民族別資料不妨作為語言方言別資料的代用品，所以這張地圖仍是迄今為止最為翔實可信的台灣語言地圖。

不過這張地圖和近年來筆者的調查有一些出入，如地圖上台北縣同安腔的永和(原屬於漳州區優勢的中和)被畫入漳州區；客語優勢的桃園新屋海邊的閩南語分佈區(大牛稠應該屬於漳州腔，蚵殼港應該是同安腔)被畫入客語區；高屏地區客家話的分佈區東緣的平埔族閩南語區被劃入客語區都是如此。近年來，我們實際踏勘，確定這些語種的存在，再根據居民的口述及文獻紀錄，確認他們居住在本地已經超過二、三百年的歷史，因此證明小川尚義地圖的錯誤。

不過洪惟仁(2006)指出這些錯誤可能因為當時的行政區域較廣闊，根據大行政區域所繪製的地圖，小至村里的語言分佈被大行政區平均掉了，因此無法顯示細微的語言區劃。但小川尚義繪製這張地圖是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因此雖然有一點瑕疵，經過考訂之後，仍然是很有文獻價值的。

這張地圖詳細記載了原住民族語言的地理分佈，說明當時對於原住民族已經有了相當精確的掌握。1935 年小川尚義和淺井惠倫合著出版《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書中也附了一張〈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附圖 2】)。這張地圖以南島語的分佈為主題，南島語的分類比前圖更詳細。依序為泰雅(Atayal)、賽德克(Seedeq)、賽夏(Saisiyat)、布農(Bunun)、鄒(Tsou)、卡那卡那霧(Kanakanavu)、沙阿魯阿(Saaroa)(以上三種在小川尚義(1907)圖上合稱為鄒語)、魯凱(Rukai)、排灣(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s)、雅美(Yami)共十二種，相當於清代所謂的「生番」；噶瑪蘭(Kavalan)、巴宰(Pazeh)、邵(Sao) 共三種屬於清代所謂的「化番」；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布拉(Papora)、貓霧揀(Babuza)、胡安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共六種屬於清代所謂的「熟番」(平埔族)。各族的部落以符號散佈於地圖上標示，前十二種原住民的分佈區另以土黃色標示。

這張地圖絕對可以確定是小川尚義的作品，其資料應該有根據總督府的調查資料，但確實有小川尚義親身調查的依據。因此如果說小川尚義是台灣語言地理學的開拓者絕對不為過。

這兩張語言分佈圖當然比後來發表的不根據實際調查所繪製的臺灣語言分佈圖都詳細而精確，其精密度也遠勝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因此我們對於小川尚義在語言地理學上的貢獻不能不給予無限的敬意，尤其這張地圖發表的年代和第一本西方語言地圖集 Giellieron 《法蘭西語言地圖集》 *L'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1902~1909）的年代相當，更加令人贊嘆。

結論

小川尚義 1896 年底渡台，在台灣總督府擔任一名編修官，總督府所出版的《臺日大辭典》的出版，總督府立即出版了《日臺小字典》（1898）、《日臺大辭典》（1907）、《臺日大辭典》（1931-32）《臺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臺大辭典》上卷（1938）都在他的主編下完成。甚至南島語辭典《排灣語集》（1930）、《泰雅語集》（1931）、《阿美語集》（1933）也是他所編纂的。

但是小川尚義是一位優秀的語言學家，他不但用他語言學的素養把辭典編纂得很好，並且用學術的態度對漢語進行了研究。1907 年總督府出版的《日臺大辭典》附錄的〈緒言〉、〈臺灣語的發音〉、〈臺灣言語分布圖〉，實為第一部在臺灣發表的語言學學術論著。

本文評述小川尚義在「漢語音韻史」、「漢語比較方言學」、「閩南語比較方言學」、「臺灣閩南語音韻學」、「臺灣語言地理學」等各方面的學術貢獻。

參考文獻

【日文部分】

- カールグレン（高本漢），1937，《Karlsgren 支那言語學概論》，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東京・文求堂書局發行。收入高本漢三篇著作：
- 〈支那語の音韻と文字〉，pp.1-136。譯自"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1923 英文版）"Ordetoch Pennanimittens Rike, Stockholm"（1918 荷文版）
- 〈言文學と古代支那〉，pp.137-306。譯自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6, Oslo(挪威・人類文化比較研究所叢書之一)
- 〈支那語のローマ字表記法〉，307-341。譯自"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1928, London(倫敦・中國學會演講錄)
- カールグレン（高本漢），1949〈中国の言語：その特質と歴史について〉，大原信一、辻井哲雄、相浦杲、西田龍雄合譯，1958 東京・江南學院發行，全書 229 頁。高本漢著"The Chinese Language, Anessayonits Nature and History"，譯文部分 1-116 頁。
- 上田萬年，1896，《言語學》講義，新村出筆錄、柴田武校訂，1975 年一月東京・教育出版株式會社，335 頁。
- 三並良，1935《日本における自由基督教と其先驅者》東京・文章院。
- 小川尚義，1903，〈廈門語に就て〉載東京・《言語學雜誌》第 4-6 號。
- 小川尚義，1906，〈臺灣語について〉載臺北・《臺灣協會會報》第 90 號。
- 小川尚義主編，1907，〈日臺大辭典〉，收入《日臺大辭典》1-212 頁，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全本收入 1993 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
- 小川尚義主編，1907，〈日臺小辭典〉，東京大日本株式會社發行。
- 小川尚義主編，1931-32，《臺日大辭典》，臺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小川尚義，1909，〈ファポラング語について〉，《言語學雜誌》第 10 號。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刀江書院。
- 小島武味，1981，〈小川尚義こと——初代國語學校教授〉，載《臺灣への架け橋》日本茨木市・蓬萊會關西支部發行。
- 山田孝雄，1935，〈國語學史要〉，收入「岩波全書」，1943 單刊發行。
- 中國語學研究會 1957，〈中國語研究史〉，東京・江南書院，全書 180 頁。
- 中國語學研究會 1969，《中國語學新辭典》，東京・光生館。

- 六角恆廣，1961，《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東京・播磨書房 277 頁。東京・不二出版社再版（1984）。
- 六角恆廣，1968，《中國語關係書書目》，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104 頁。
- 六角恆廣，1988，《中國語教育史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局。
- 六角恆廣，1991-1993，《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
- 仁田義雄，1989，〈日本語學史〉，收入《日本語概説》第十章，pp.307-332。
- 平澤平七，1914，《台灣俚諺輯覽》，台灣總督府。
- 平澤平七(丁東)，1917，《台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台北・晃文堂。
-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1935，《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出版。
- 臺灣教育會，1939，《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編者發行，正文 1098 頁，年表 71 頁。
- 永島榮一郎，1941，〈支那語學と云うもの〉，《中國文學》74 期。
- 石田幹之助，1942，《歐米における支那研究》，東京・創元社。
- 石剛，1993，《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231 頁。
- 田中秀夫，1969，〈新村先生を悼む〉，《言語研究》第 54 號，日本言語學會發行。
- 吉野秀公，1927，《臺灣教育史》，臺北・著者發行，580 頁。
- 伊澤修二，1895，《日清字音鑑》，東京・著者發行。1900.7 再版。
- 伊澤修二，1904，《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東京・著者發行。
- 伊澤修二，1904，《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說書》，東京・著者發行。
- 伊澤修二，1915，《支那語正音發微》，東京・著者發行，正文 473 頁。
- 安藤彦太郎，1955，〈中國語教育の歴史性格〉，早大政經學部「教養諸學研究」二。
- 西田龍雄，1958，〈B.Karlgren の業績と漢語學〉，收入《中國の言語》東京・江南書院。
- 佐藤源治，1943，〈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發行。
- 村上嘉英，1966，《日本人の臺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日本文化』45: 62-108。
- 村上嘉英，1973，〈伊澤修二のこと〉，載竹內好《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文藝春秋」出版。
- 村上嘉英，1985，〈舊植民地臺灣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學學報》144: 22-35。
- 金田一京助，1939，〈國語學史と上田萬年先生〉，東京・《中國語學》4.1。
- 長志珠繪，1993，〈言語學の「受容」〉，《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59: 228-247。

- 波多野太郎，1986，《中國語學資料叢刊》東京・不二出版。
- 酒井亨，1994，〈小川尚義——ある偉大な臺灣語學者と故郷・松山〉，東京・《ふおるもさ》1994.8:1-8。
- 時枝誠記，1933，《國語學史》，收入「岩波講座」《日本文學》，1940 單刊發行。
- 倉石武四郎，1941，《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局。
- 馬淵東一，1945，〈追悼小川尚義教授——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載《民族學研究》13 卷 2 號，收入《馬淵東一著作集》卷三 pp.485-500。
- 埋橋徳良，1991，《伊澤修二の中國語研究》，日本長野縣・銀河書局。
- 陳恆嘉編、洪惟仁補，1992，〈日治時代臺語著作目錄〉，《臺語文摘》1(總 25): 36-39。
- 陳恆嘉，1993，《日本の領臺期における臺灣語教育と研究の一考察》，臺北・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魚返善雄，1937，〈支那言語學の任務と方法〉，《中國文學月報》24。
- 國府種武，1931，〈臺灣にお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言語と文學》雜誌 3: 51-94; 4:83-119。
- 國府種武，1931，《臺灣にお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臺北第一教育社發行。
- 國府種武，1936，《臺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過去と現在》，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 國府種武，1939，《日本語教育の實際》，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發行。
- 野村雅昭、小池清治合編，1992，《日本語事典》，東京・東京堂發行。
- 蔡茂豐，1977，《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中文部分】

- 王力，1963-64，《中國語言學史》，北京・「中國語文」月刊 1963.3-6;1964.1-2(即總 124-129 期)；合訂本 1967.5「中國語文」印行；1981.8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訂單行本；1972.4 臺北・泰順書局重刊繁體字版；1987.7 板橋・駱駝出版社重刊繁體字版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委會 1991.3《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174 頁。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9.(1+2):1-61.1980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 李壬癸、土田滋，2001，《巴宰語詞典》，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 吳守禮，1955，《近五十年來臺語研究之總成績》，著者油印發行。
- 吳守禮，1970，《臺灣省通誌人民志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何耿鏞，1984，《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何大安，1993，〈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4: 713-731。
- 林語堂(譯)，1923，〈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3: 475-498，收入林語堂《語言學論叢》，pp. 162-192。
- 村上嘉英，1989，〈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期對臺灣閩南方言音韻的研究工作〉，天理大學學報 160:27-40。
- 周法高，1987〈憶李方桂先生〉，《書和人》第 582 期。
- 周斌武，1987，《漢語音韻學史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 高本漢著，1915-1926《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 商務印書館出版。
- 邵敬敏、方經民合著，1991，《中國理論語言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發行
- 洪惟仁，1985，《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自立晚報。
- 洪惟仁，1992，〈日據時代的臺語教育〉，《臺灣風物》42.3:49-84;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 1-12 臺北·武陵書局
- 洪惟仁，1993，《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0 大冊)臺北·武陵書局
- 洪惟仁，1993，〈日據時代的辭書編纂〉，《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 12-26，臺北·武陵書局
- 洪惟仁，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洪惟仁，1994,12.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史研究》1.2: 26-84。
- 洪惟仁，2006.〈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365-416。
- 張世祿，1937，〈高本漢與中國語文〉，「語文月刊」1.5；收入《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選集》，1984，pp. 176-184，上海·學林出版社。
- 張世祿(譯)，1937，《漢語詞類》，商務印書館
- 黃弗同主編，1988，《理論語言學基礎》，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 黃秀敏，1994，〈日本學者對臺灣南島語研究的貢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臺灣南島語民族母語研討會」發表論文。
- 董同龢，1981，〈高本漢的詩經研究〉，《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集》，pp. 307-312。
- 丁邦新編臺北·食貨出版社。

董同龢，1981,〈近三十年的中國語言學〉，pp. 371-382。丁邦新編臺北・食貨出版社。

董同龢，1985,《漢語音韻學》（1964 初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八版。

蔡培火，1969,〈本人對臺語註音符號工作的經過〉，《國語閩南語對照辭典》序言。
臺北・正中書局。

羅常培，1931,〈廈門音系〉，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4，1975 年古亭書局複印

羅常培，1934,〈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原刊《東方雜誌》（1934）31.7；收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pp.142-156。

羅莘田，1935,〈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32.14: 35-45。

【西文部分】

Doi, Toshio, 1976,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Japan". 《日本言語學外史》，Tokyo: Shionozaki Shorin.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倫敦・Glasgow 出版。俗名《廈英大辭典》，臺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Doty, Elihu, 1853,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Amoy dialect", 漢名《英華廈腔語彙》，Amoy.

Edkins, J.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Edkins, J. 1857 "A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Edkins, J. 1874, "Old sounds". inserted in Williams(1874).

Giles, Herbert A.(翟理斯)，1892,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華英大辭典》Shanghai. 1912,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Karlgren, B.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oteborg. 1930, 北京影印，題為《中華語音學研究》。

Karlgren, B. 1922,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漢語中古音的擬測〉，T'oung Pao: 2.21: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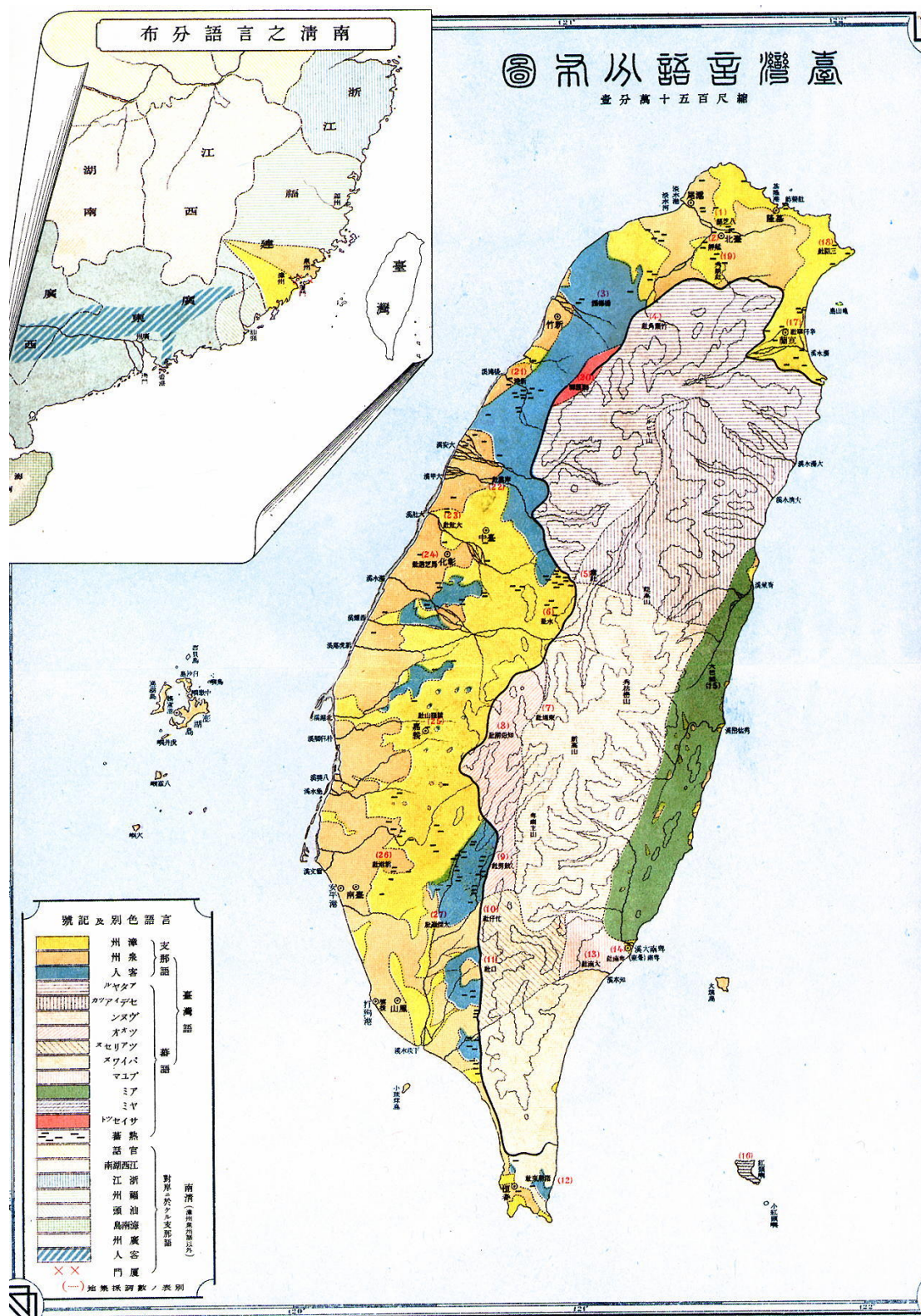
Karlgren, B.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中日漢字音分析字

- 典》Paris.
- Karlgren, B.1923,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中國語與中國文》，London.
- Karlgren, B.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語文學與古中國》，Oslo.
- Karlgren, B.1928,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漢語上古音當中的幾個問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769-813.
- Karlgren, B. 1928,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漢語羅馬字拼音論》，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 Karlgren, B.1931, "Tibetan and Chinese".〈藏語與漢語〉，T'oung Pao, vol.28.
- Karlgren, B. 1932, "Shi King Researches" 《詩經研究》，BMFEA4.
- Karlgren, B. 1933, "WordfamiliesinChinese" 《漢語詞族》，BMFEA5.
- Karlgren, B.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中日漢字形聲論》BMFEA12.
- Karlgren, B., 1949 "The Chinese Language, Aneessayonits nature and history" 《中國的語言》NewYork. The Ronald Press.
- Karlgren, B.,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中古及上古漢語語音學簡論》，Stockholm.
- Marshman, 1809,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引自 Volpicelli(1896).
- Maspero, H. (馬伯樂)，1912, "Etudes sur la phone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initiales". BEFEO(Bulletin de l' Ecole Francaise cel' Extreme Orient):12.
- Maspero, H. (馬伯樂)，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唐代長安方言》BEFEO:20.
- Medhurst,Walter Henry (麥都思)，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福建方言字典》，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China. 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Mollendorff, P.G. von. (穆麟德)，1899,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es Chinois." Ning-Po.
- Schaank, S. H. 1897-98.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 T'oungPao: 8.1: 361-377(1897), 8.2: 457-486(1897), 9 28-57(1898), 新 2.3:106-108(1902).
- Schlegel, G. 1872, "Sinico-Aryaca" Batavia.
- Schlegel, G. 1882-1890,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 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Karaktersinhet Tsiang-Tsiu Dialekt."《荷華文語類參》四卷，Leiden:E.J.Brill.

Volpicelli, Z.1896,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imes" Shanghai.

Williams, S. W. (衛三畏廉士甫), 1874,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Yuen-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漢英韻府》,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滬邑・美華書局).1903 second edition.

【附圖 1】小川尚義(1907)〈臺灣言語分布圖〉



【附圖 2】小川尙義、淺井惠倫(1935)〈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圖布分語言族砂高灣臺

